

如果说李安《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因为对美国英雄主义有所冒犯而导致评价不高,那么《血战钢锯岭》则以一次纯粹的、热血的、如假包换的美式爱国主义让美国观众精神为之一爽。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血战钢锯岭》绝对不是简单粗暴的战争电影,拍一部《敢死队》式的电影,也不是梅尔·吉布森的本意。对信仰的坚持与表达,才是《血战钢锯岭》的核心。

看过《耶稣受难记》的观众,也许还会记得梅尔·吉布森在那部电影中给观众带来的战栗,当年那部充满神性的作品,对人们心灵的冲击是巨大的。梅尔·吉布森把拍《耶稣受难记》时的理念带进了《血战钢锯岭》,只是在表达信仰主题时,梅尔·吉布森不再那么激烈,他用一个柔和的、近乎阿甘式的形式——小镇青年戴斯蒙德·道斯,肩负起传递上帝力量的责任,并成功地让观众相信了他所叙述故事的真实性与可信性。

《血战钢锯岭》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之所以具备改编价值,是因为人物原型拥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他想冲上战场为国效力,却因为信仰上帝不愿意拿起枪作战。当镜头转向血腥的钢锯岭的现场,当刚建立起感情的战友纷纷倒于血泊中,当每个人在日军压迫式的扫射下疯狂地寻找武器时,戴斯蒙德依然不肯拿起武器复仇,他的军医身份,要求他把救人当做第一使命。杀人与救人,构成了这个故事的矛盾与冲突,也带来了一个关于战争的永恒疑问:杀人是拯救世界的最后办法吗?人类无法解释这亘古以来的困惑,于是,除了要在现实层面

[观影笔记]

血泊之中举起橄榄枝 《血战钢锯岭》:

□ 韩浩月



找到合理、有力的借口外,还要从信仰那里找到支持。

戴斯蒙德在这个故事里成了上帝的代言人。当他在战场上营救出75名战友后,人们宛若看到奇迹发生,基

督降临,一个普通的士兵身上有了神性的光辉。这极大地激励了战友的第二次冲锋,美国士兵们列队等待戴斯蒙德的到来,因为他们觉得,有戴斯蒙德在,就等于上帝站在了他们这一边,胜利的几率、存活下来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战争的正义性,都变得清晰可见。

在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前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与日军的交手并没有形成碾压之势,相反,日军残忍且凶猛的作战方式,让即便拥有炮火优势的美军也感到头疼。美国军人需要解决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为谁而战、战争的意义、杀戮与和平的关系等等,《血战钢锯岭》为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提供了答案——战争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家人与家园,也在于重新发现人性、实现人性救赎,而这部电影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戴斯蒙德,一个貌似逃避战争的人,很好地化解了战争造成的心境困境,他告诉观众,解决战争的终极办法不是恨,而是爱——所以当观众为他神经病似的在救战友的同时也救了几个日本兵而哄笑的时候,那恰是他最可爱的地方。

在当下,《血战钢锯岭》也颇具一些改善美国形象的公关作用。在不少人看来,美国人好战,动辄使用武力,但这部电影对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美国军人拿起枪,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其实更多美国民众是像戴斯蒙德那样,期望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取得胜利的。不拿枪取得的胜利才是真胜利,至于拿枪,只不过是获取胜利的必要辅助手段,正如一个难解的哲学命题那样:战争是为了带来和平,和平的代价是付出

必要的杀戮。

《血战钢锯岭》是相对少见的两段式结构,前半段重点渲染戴斯蒙德的小镇生活与爱情以及他独特的信仰与周边人群产生的冲突,后半段则大刀阔斧地表现战争的血腥,梅尔·吉布森拒绝特效,炸掉一个农场实地再现了钢锯岭的地貌,真实拍摄强化了影片的真实感与冲击力。但影片的血腥镜头确实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为了服务主题,战争越残酷,戴斯蒙德经受的信仰考验就越残酷,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电影的后半段故事,难免让人联想到中国影视剧常出现的“手撕鬼子”的情节,中国观众已经对类似的情节比较敏感,每当发现夸张的情节或镜头,总不禁质疑创作者的目的与动机。就电影改编来看,戴斯蒙德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在战场上始终没有拿起枪、没有杀过一个敌人也是真实的,救起众多战友也是事实,影片不会对故事的主要看点动手脚,但在情境渲染方面,肯定会有夸大,当然,用通常的说法叫“艺术加工”。

略微让人觉得欠缺的是,梅尔·吉布森在处理前半段故事时耐心、细腻,到后半段时有些着急,过于强调戴斯蒙德的“求求上帝,让我再救一个”,在表现救人情节时单一化了。同时,戴斯蒙德与日军在钢锯岭上的周旋,也缺乏一点逻辑,显得日军有点愚蠢。如果能把这些遗憾处理好的话,《血战钢锯岭》会在美国评论家选择奖以及奥斯卡上有更大一点的夺奖可能,毕竟,美国人喜欢这一口,在故事与价值观能征服他们的前提下,也许他们会为影片的瑕疪视而不见。

[文化论坛]

别让烂封面坏了一部好书

□ 许民彤

最近有一幅图书封面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学者张鸣在微博上贴出著作《张鸣重说晚清民国》的书影,表示出版商的封面设计令人无奈:将作者照片拼接于历史人物身边,穿大红衣服的教授与黑白的慈禧太后“排排坐”,简单粗暴的图片处理使得封面画风诡异,与较严肃的书籍内容颇不协调。张鸣说,他不同意使用这个封面,但出版社已将书籍出版……这引发了网友对书籍封面设计的疯狂吐槽,还有人找出同系列书籍的另一封面,封面设计如出一辙,甚至更加违和:作者与袁世凯“勾肩搭背”,仿佛穿越了一般。

时下的图书市场上,图书封面设计其实不乏类似的问题。

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一书,内容是关于县委书记们在中国基层工作的调查实录,但是,该书在封面设计中却以占三分之一的特大字体仅仅突出“谋略”二字,以谋略、厚黑之类的图书设计风格吸引眼球。

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人间失格》直接把腰封印在人物的脸上,不仅无法看清人物,而且,腰封的设计异常武断,简单粗暴,没有章法。

韩语版《三体》的封面,大概是随便找了一幅中国年画提取图像,那个作揖拜年的娃娃难道就是设计者心目中的科学家(《三体》主人公)?这种封面设计让读者不知所云,如坠雾中。

有两本描写北洋军阀大佬孙传芳的图书,封面却都“找错了人”:一本把皖系段祺瑞的图片当成了“孙传芳”,另一本则把奉系张宗昌的图片当成了“孙传芳”。而一本名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的图书,其中“福将”刘峙却错用了孙传芳的头像。

类似张冠李戴的笑话还有很多,比如一本名为《康有为文集》的封面上赫然印着梁启超;一本《康德论人性与道德》封面使用的却是贝多芬的头像……

这当中有历史常识性的问题,有思想内容混乱方面的问题,有装帧审美艺术格调的问题,有专业素质缺失的问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文化界的浮躁之风,文化因与商业搅作一团而愈发显得不伦不类,这对于众多爱好读书的人来说,不啻为一种阅读灾难。

由此,笔者不禁想到知乎网上曾有关于图书封面设计问题的调查,读者纷纷吐槽“哪些烂封面坏了一部好书”,这无疑是对书籍封面设计的一种警示。

作为图书的附属品,封面是图书装帧艺术设计的一部分,再加以对书籍内容简洁灵动的介绍,不仅可以方便读者选购图书,还成为书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错误的、糟糕的封面设计却严重影响了读者的阅读感受。而这些年来我们阅读的一些图书,恰恰是在封面设计这个关键点上出了不少问题,有的不惜拉低底线进行“粗鄙化”、“垃圾化”的设计,有的装帧豪华而分明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从书籍装帧艺术的角度说,书籍如人衣,让一本书穿上得体的时装,它们就从一叠印刷品变成了一件艺术品。理想的装帧艺术设计可以使书籍内容与形式得到完美结合,装帧设计首先要贴心:一是要贴近作者的心,书籍设计风格跟这本书的作者要风格搭配、气质一致;二是要跟读者贴心,不能让人觉得望而生畏或反感。而对封面设计最低标准的要求,至少是要杜绝以上所说的种种“烂封面”,不要让文化垃圾污染了读者的眼睛。

[第三只眼]

「艺二代」扎堆当导演

□ 黄德海

简的电影版《一句顶一万句》好好地守住了自己的局限,把问题控制在一部电影的范围之内,没有纠缠磕磕或虚情假意地去假装完全覆盖小说的内涵,而是老老实实将电影设定的范围里精雕细琢。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刘雨霖并没有借重小说广为人知的絮絮叨叨的明显特征,也没有求助于电影技艺更为熟稔的朋友,而是用自己习得的电影技艺,不计工拙地为电影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她的技艺,她的取舍,她的生涩和稚拙。尽管偶尔某个转折、某些镜头略显生涩,有些对白过于文艺,但对卑微人物的寒酸和他们似乎总是不经意的善意的捕捉,仍然让电影保持着相当不错的水准。这部电影让很多人不满的,恐怕是对主题的表达过于直接和用力,因而让小说中蜿蜒千言万语说不尽的委屈变成了具体的委屈。委屈一旦具体,也就不再是委屈,而只是某个需要明确的原因。“说得着”或“说不着”的原因一经说明,电影内在的叙事张力立刻消散,剩下的只是观众等待人造悬念消解的惯性运行而已。

然而,这部属于刘雨霖的“我拍的电影”,除了百慧把父亲毁掉再买的玩具汽车丢进锅里煮,并在父亲拒绝

容——人物由原著的上百人缩减到电影里的七八个人,时间和空间由十几年的千里奔波收紧到一个家庭的分分合合。更重要的是,复合在原著小说里有雄浑的历史景观和复杂的文化思考,不得不在电影里落实到家庭伦理问题上。

可以肯定的是,删繁就

母亲见她之后独自坐在小椅子上发呆,很难看出导演对这个世界的独特认知或者她努力传达的内心世界图景是什么。说得更清楚一些,这个电影里刘雨霖观看世界的方式,主要是从刘震云即父辈那里学来的。在一部“我拍的电影”里,讲述的竟然是父辈的故事,并且是以父辈的视角来看的他们的故事,多少有些奇怪,不是吗?不是从自心生出的故事,即便加进再多自我因素,再怎样善于体察故事中人的心思,这故事也仍然是属于他者的,导演不过是某种形式上的代言人,不会是“我的电影”。

毫无疑问,刘雨霖足够聪明,聪明到模拟父辈的世界和视角,仍然拍出了一部堪称出色的“我拍的电影”。可只要还不是从她自己心里流出来的故事,不是认认真真地拍“我的电影”,再多的聪明也只能让人觉得心里奇痒无比的地方始终不会被搔到——这或许才是电影未能得到更多认可的真正原因。深夜独坐的小百慧,其实已经有了属于她自己的孤独,不同于她的父亲牛爱国,也不同于她的母亲庞丽娜。她的孤独会长成一棵属于自己的大树,这棵大树的故事,只有她自己才讲得出来,才讲得好。而父辈的故事,他们自己会讲。

(据《文汇报》)